

文学的

斯岸

顾超

著

中国作家的
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

王蒙

叶延滨

叶辛

梁晓声

张抗抗

贾平凹

周大新

范小青

刘醒龙

欧阳江河

柳建伟

格非

李浩

徐则臣

文学的

顾超

著

斯岸

中国作家的
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 / 顾超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5

ISBN 978 - 7 - 5117 - 3300 - 9

I. ①文…

II. ①顾…

III. ①作家 - 访问记 - 中国 - 现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639 号

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

出 版 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朱瑞雪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188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序 言

“文以载道”不仅是一条古训，而且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一种准则。文学作品通常被读者赋予某种意义和价值，作家也往往是被政府期望承担某种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这在中国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倡导“无中心”和“无价值”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但至少在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仍然处于主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远未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广义上来理解中国传统的“道”，其实也可以把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无中心”和“无价值”，视作一种新的“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作家必然拥有某种“道”，即某种价值观，而且这种“道”也必然会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中。我以为，顾超博士的《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就是在探寻当代中国作家身上所存在的这种“道”。

通过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著名作家，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以此来了解他们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学作品、核心价值和管理体制的看法，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

首先是技术性的困难：有多少著名作家会愿意接受这样的访谈？名人大都是忙人，一般不愿意接受外人的访谈，何况这样的访谈还可能会涉及敏感的话题。其次是实质性的困难，即设置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捕捉到这些著名作家内心所体认的“道”？设置的问题不当，即使作家们接受了访谈，同样也难以了解其真实的价值观。当顾超在从事这项研究前征求我的意见时，尽管我赞同他的研究计划，但心中充满担忧。然而，当读完这部文稿时，我可以高兴地说：作者最后所取得的效果超过了我的预期。这当然得益于他在作家出版集团工作的便利，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精心设置的问题，不仅打动了作家的心，而且透过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他们的真实心态。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读到第二本这样的书，能够把这么多著名的作家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就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直陈自己的观点和评论。通过这些访谈，读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当代中国的代表性作家群体，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甚至所作所为，并进而窥见当下中国文学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以及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的现实关系。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而且也是对当今中国作家群体和文学现状的一个真实记录。

作家们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看待文学的社会功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这是我首先关心的问题。令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多数作家对自己的社会定位相当低调，多半都把自己放在社会的中间阶层，有些甚至更低。尽管他们都肯定文学的

社会政治功能，但普遍认为文学的政治作用不应再被放大。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文学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在传播和形塑读者的政治价值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不仅设置了规格很高的专职管理机构，如文联和作协，而且始终把文学当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从顾超与作家们的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正统的文学政治观即便在这些主流作家身上，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文学的政治价值和教化作用正在逐渐淡化，日益让位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美育作用。

作家们如何看待政治？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位政治学者，这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作者直截了当地向作家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例如，他问作家们，如何认识和平、发展、公正、正义、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如何评价现行的作协体制？作家有无共同利益？怎样评价文学的多元发展？如何看待文学的公共空间？除了中国之外，哪些国家是他们最为向往的？作家们的回答当然各不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关切。例如，尽管优先顺序有所不同，有些理解也不见得十分准确，但他们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这些人类社会的普遍政治价值都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化生存和发展状态忧心忡忡，对现实政治十分审慎，而对未来的中国则仍带着美好的憧憬。

文学家通常都回避直接参与政治，即使有现实的政治关怀，也会通过其文学作品来表达。但也总会有一些作家毫不隐讳地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问题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此来宣

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代中国作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文革”的彻底否定，预言“文革”重来的不可能和不可接受，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其中，尤以梁晓声先生的观点最为突出。作者对梁先生念了这样一段话：“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听完这段话后，梁先生直言不讳地说：“是我写的。”

顾超博士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学子，他大学就读于工科院系，最后却与文学和政治学结下了业缘。其文学的笔触与政治学的分析，在本书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作者旨在揭示“文学的彼岸”，但其出发点却是文学的“此岸”；书中大量的内容是访谈的实录，但间或有作者自己独到的评论；读者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作家们的文学观点，也能发现其背后的政治关怀。因此，这本书读起来既像是学术著作，也像是纪实作品。

俞可平

2017年3月26日 初稿于日本鹿儿岛县垂水市

3月31日 修定于京郊方圆阁

前言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小时候读简版的《史记》，对商周时期近乎传说的历史饶有兴味，除了烽火戏诸侯的荒诞画面感，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话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后来知道了广开言路这个词，懂得让各路贤达畅所欲言是自古以来漫长专制时期有限的一点开明。中国历史上但凡能做到广开言路的君主，就算不是一代天骄，大抵不太会是昏君，可惜能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多。从京城外童言无忌的民谣中往往便可听到一个言路闭塞的王朝走向衰败的先声——听不到或假装听不到的，只是叫不醒的装睡者而已。对于传统中国，诚如俞可平教授所言，民本主义是理想，官本主义是现实。因而话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不管想行王道还是霸道，想要宣武还是崇文，怀柔天下才是最要紧的。王道无非也是一种儒家的理想，多数时候沦为宣传的话语，在现实中几乎没有真正实现过。当然，无论是精英对统治者的谏言，还是士大夫阶层的理论，所谓的话语、言论，还是重要的。这种维护统治的话语，是一种前现代的权力。

在正统的历史记载之外，前现代话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文学与哲学的滥觞。《诗经》和《荷马史诗》是中西方文学的起

点，《论语》和《理想国》更是直接采用了对话和语录的形式，代表了雅斯贝尔斯定义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百姓的话语、英雄的话语、哲人的话语，构成了从神话到哲学，从民歌到文学的嬗变。若单以中国的历史看，在之后大一统居多的时代，文学与哲学的话语如果不是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就是在统治力所不能及的缝隙中旁逸斜出，留存至今。

近代以来，中国人心中万国来朝的世界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残破的中国巨轮在现代性的门槛上蹒跚前进。西方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思想巨擘们耀眼的光芒不断指引人类前进。1840年打醒部分中国知识精英的，不仅是对船坚炮利的恐惧，更有对先进制度文明的向往。为了让东亚病夫睁眼看世界，严复翻译了赫胥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西方思想家的作品。其中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现译为《论自由》）给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经典论述：“在精神奴役一般的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意见不论怎样真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活的真理。”（《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页、第40页）如今，不管实行的是何种政治制度，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都会有保证言论自由的条款。在完成思想启蒙之后，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演变，是现代性话语结构转型最深刻的标志。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随着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训练和培养了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公众，使得个体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文化共同体中。资产阶级的理想类型是文学公共领域从完备的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中发展成形。与思想启蒙互相呼应的是，公共领域中的话语表征了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话语成为了一种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符号。

话语在当代西方思想界正发生新的演化。质言之，话语从一种前现代的权力转化为权利本位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符号后，由于对理性不同角度的发展、反思和批判，衍生出新的意义。

一条进路是公共领域视阈下对理性的继续发展。理性是现代性的根本精神。自康德至罗尔斯，西方自由主义高度推崇公共理性。假设有一个类似于罗尔斯定义的正义环境，处于原初状态的人们在无知之幕后一致同意了公平的正义，于是各种多元的价值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内自由、公开和理性的讨论、批判达成共识，形成公众舆论以至立法。但对于市民社会发展不成熟的转型期国家而言，缺乏孕育公共理性的环境。这是当下的中国不能照搬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因。哈贝马斯的后期著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他将单一主体的主体中心理性置换成交互主体的交往理性。交往是以协商为原则、以同意为机制、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过程，追求不同对话主体的平衡，因而交往理性建立在主体间的参与、对话基础之上。话语成为了交往理性的

重要介质，是协商民主的载体。

第二条进路是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社群主义则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他们认为：自我的本质就是它的构成性，它是由目的构成的，而这些目的是由个人所处的社会现实环境决定的，所以，自我的本质是社群的属性。个人的成员资格对其自我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群主义者把社群看成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个人的善与社群的善结合在一起，真正的善就是个人在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时，同时也实现了社群的公共利益。社群主义的话语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首要目的，话语彰显了共同体的存在。

第三条进路是后现代的话语。福柯代表了尼采之后对理性最深刻的质疑：“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相比之下，古典时期的拘留是对语言的压制，但语言没有被真正消除，而是掺入各种事物中。现在，对话停止了。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有三种形塑话语的排斥系统——禁止的言语，疯狂的区分和真理意志……制度对形塑话语的外部排斥系统提供支持。”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即权力”，是一种新的权力微观机制。这种话语形态在最近“知乎”等网络问答社区在中国的兴起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网络中知识精英们追求的不是传统的人支配人的权力，而是话语本身。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当代作家的话语。用访谈的方式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们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说出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深刻洞见，说出对当下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真知灼见，我可能不是第一人，但我努力创造了一种对话的场域。如汪民安所精妙概括的，马克思将主体置于经济关系中，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尼采将主体置于道德关系中，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而我则要把主体置于话语关系中。前人对作家的访谈，自然是谈文学创作，最多谈一点对时事的看法。我则更愿意跳出这个小圈子：我与作家们谈的，大多并非囿于文学本体，而是以文学为引子，一方面向内探求主体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往外延伸，涵盖了很广的范围。

文学要赋予现实生活以意义，所以作家的话语基本都处于公共领域的范畴中。查尔斯·泰勒把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民主自治定义为现代社会想象。作家的社会想象是什么？梁启超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如果把小说家和诗人们在文学内外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称为社会想象，那么

我的目的就是通过作家们的话语凝练出文学公共领域的社会想象。

话语理性和社会想象并不一定是针对现实政治的。恰恰相反，由于对现实政治的主动疏离，我一度渴望回到古希腊的哲学世界，如汉娜·阿伦特所言，那时候的诗人赋予言辞和作为（word and deed）以不朽声名，使它们存在的时间不仅比它展现时转瞬即逝的一刻长久，甚至比言行者自己的生命更长久。与中国的当代作家和诗人们深入交谈后我发现，其实这种不朽性在一切都处于快速变革当中的中国依然存在，只是隐藏得极深。身在功利的现实环境中，我四顾茫然，无所适从，那就只能越过文学本体去寻找文学的彼岸——在那里等待发掘的，并不是文学与政治的联姻，而是哲学化的文学。把既不媚权也不媚俗的话语忠实记录下来，对我个人而言是康德式“无功利的愉悦”，对后世也可能是一件不朽的盛事。“80后”的我也许不得不辜负这个时代，但我会努力做到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和智识。

文学是最体现语言魅力的领域，作家是最擅长以语言表达自己的群体。与作家对话，是人生妙事。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是感性的人，我却逼他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回答他们平时不太去想的问题，确有强人所难之嫌。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很多时候他们会明言：“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个坑，但我仍然要往里面跳。”我访谈了十多位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他们普遍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看重作品的社会价值超过个人利益，想以自己的文字观照人类精神世界。他们擅长讲故事，但更怀着仁者之心，希

望藏在故事之后的隐喻与深思能影响更多人。我相信，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作家的话语不仅在文学史，也会在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了著名的洞穴观影的譬喻，作家也许就是那些最先走出洞穴看到真实世界的人。大作家的视野所及之极限，便是人类普遍的超越性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不存在，就什么都能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需要重塑价值和超越性的信仰，需要在相对的虚无中找寻绝对的意义，这是发展本身所不能解决的，甚至比发展更为重要的问题。文学艺术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作家们的话语更不可能让中国立刻走出当下的任何实际困境，但他们独具个性地讲出了精彩的中国故事，他们锤炼着永恒的中国精神。借用两位没有接受我访谈的著名作家的话：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因为卑微，所以写作。

以中国的作家为研究对象，不可能绕过作协。作为中国特色的组织文学创作和团结作家的重要人民团体，作协理应是重要的政治学研究对象。但事实上，虽然作协体制在公共舆论中一直极具争议，但从学理出发的相关研究极少，这方面政治学的研究更几乎是空白。目前跳出传统的当代文学史来探讨作协制度的代表作就两本书，一是李洁非等著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作协对文学的领导和不同时期作协体制的转型；还有一本是吴义勤主编的《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探讨了作协制度、作家身份、文学评奖、期刊制度、文学生态等重要课题。我在此基础上，综合对比葛兰西的

文化领导权、法团主义（统合主义）、社群主义和文学公共领域思想，以此形成剖析和透视作协体制的政治哲学，作为本书的学理背景。另外，让作家谈谈对作协的意见和建议，也是为群团组织的改革做一点实际的贡献吧。

本书主要是我博士后学术研究的成果，与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相比，删去了实证分析和一些晦涩的理论。当我下笔时，总是沉浸在与作家们的对话中，陶醉于流动的思想，享受着文学的盛宴。我尝试用复调式的手法写作，用文学而不是政治学的语言形式完成内容的表达，一方面是受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近作《二手时间》的启发，另一方面是想尝试一下这种介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写作。著名政治哲学家以塞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对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名作家、诗人的采访和回忆，读之仿佛看到了处于黑夜中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一点星火；阿列克谢耶维奇堪比伯林，并且她更擅长挖掘普通人内心深处的幽暗。伯林的书中，始终有个“我”在观察、对话、叙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则隐身在“他者”之后，她的忧虑和深思都已经藏在难民、技术员、医生、建筑师等普通人的口述语言之中。在我看来，复调写作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人文关怀。作家们的话语在我耳边萦绕，像一首交替使用复调与主调音乐的奏鸣曲。每一位作家的话语都是独特的音符，不会淹没在统计分析的冰冷数字之后；他们每个人都是文学公共领域内的主体，无论是“30 后”的王蒙，还是“70 后”的徐则臣，当然也包括“80 后”的我自己。

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俞可平教授和杨雪冬教授的指导和无私帮助。感谢我的爱人丰怡帮助我整理了绝大部分的访谈录音。特别感谢《小说选刊》主编高叶梅帮我联系了很多作家。当然，必须感谢接受我访谈的王蒙、叶延滨、叶辛、梁晓声、张抗抗、贾平凹、周大新、范小青、刘醒龙、欧阳江河、柳建伟、格非、李浩、徐则臣。

顾超

2016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篇 文学与政治/ 1

我的真正的追求，只能通过文学来靠近/ 3

“文革”状态不会再在中国出现/ 9

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是中国最主要的

女权问题/ 23

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 34

和 弦/ 48

第二篇 何以为文/ 69

在阅读中被塑造和修复/ 71

纯文学只跟人的最高心智有关，跟语言的最高

虚构方式有关/ 78

文学一定要表现人应该怎样/ 83

文学从来就有对社会的观照/ 90

在很小的缝隙中表达自己/ 96

和 弦/ 102